

基隆住民群像 部落社會及 1626 之後

文／林逸帆（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）

「雞籠山」出現在歷史文獻上，早過於臺灣島上的其他地區。16世紀的針路記載，福州往琉球的航線中，「雞籠山」是航線轉折的指標點。

雞籠的文獻記載與地名由來

16世紀中葉鄭舜功出使日本，記錄往日本航線而作成《日本一鑑》，當中〈萬里長歌〉記載「或自梅花東山麓，雞籠上開釣魚目。」該條下有文字說明「梅花，所名，約去永寧八十里，自所東山外用乙辰縫鍼（東南東、110度）或辰巽縫鍼（東南、130度）約至十更，

取小東島之雞籠山。」從福州長樂梅花所外的東山出發，以船頭前面為北方，往東南東方或東南方走十更（每一晝夜分為十更），取「小東」之域的「雞籠山」，再取「釣魚嶼」（這裡所謂的「取」指尋找方位）。

相關的歷史文獻有《籌海圖編》、《順風相送》、《四夷廣記》等，皆有類似紀錄，當中該指標點為「雞籠山」、「雞籠嶼」、「雞籠頭山」、「雞籠頭」。這裡的「雞籠山」不見得指廣泛的雞籠地區，但也不一定是單指「雞籠嶼」。記載航海路線的針路簿中所指的「山」，並非真指山頭，而是泛指島嶼、陸地等，與後來清代方志指「雞籠山」應有所區別。

「雞籠」這個地名並非只出現在臺灣島北部，在漳州語系的航海者中，在東亞從北到南（見《順風相送》），就可見三四處的「雞籠」地名，都是因「關雞的籠子」之模樣而命名。

16世紀末，從大明漢籍文獻的紀錄來看，漳州等沿海地區的人已經拿著合法的捕魚船引，進行非法走私。「及販雞籠、淡水者，往往私裝鉛硝等貨，潛去倭國，徂秋及冬或來春方回。」（許孚遠《敬和堂集》）雞籠已不再只是航線上的指標點，成為真正海上交易地。



▲ 17世紀末雞籠生活民情與山川形勢。（圖片出處／〈康熙臺灣輿圖·摹本〉，典藏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）

17世紀之前雞籠的涉外關係

16世紀末，慎懋賞《四夷廣記》記載：「雞籠國、淡水國俱出硫黃，杭人販舊破衣服換之，俱硫土載至福建海澄縣。」17世紀初，除了原有的馬賽人（basayers），還有來到此貿易或居住的漢人、日本人。1616年長崎代官村山等人遠征臺灣前，福建巡撫收到琉球中山王派通事告知日本將取雞籠山，從日本長崎貿易回來的商人亦稱「造船二十餘，挑選倭眾奪占東番山，意在互市。（黃承玄〈題琉球咨報倭情疏〉）」

17世紀初期，張燮《東西洋考》稱：「雞籠山、淡水洋在彭湖嶼之東北，故名北港，又名東番云。」代表漳州人士對於雞籠、淡水的認知。1600年至1620年代，從大明國文人對臺灣的記述得知，臺灣島與大明國之間已有一定程度的往來；同時期的《明代海防圖》的繪製，展現對臺灣西部沿海的了解。該地圖上已有「雞籠港（Ke-lāng-kāng）」與「雞籠（Ke-lāng）」兩個地方的區別，該圖的「雞籠港」指和平島與對岸之間的港口，基隆市區則是文獻常稱的「雞籠頭」。

1626年，西班牙道明會神父白若瑟（Alvarez）將和平島稱之為「聖救世主／聖薩爾瓦多／San Salvador」，位於和平島南邊一帶的港口稱為「聖三位一體／聖千里達／Santísima Trinidad」港。

從大明國人及日本人對於雞籠的認識與記載，顯示這裡已經是個交易之地，為漢人、日本人與原住民三者交互

交易的地區。16、17世紀的文獻顯示，這個地區已有貿易活動。1610年日本的耶穌會神父Giovani Rodrigues Giran曾提及淡水、雞籠一帶原住民仇視外人，漢人例外，漢人有交「稅」給雞籠人，故可停留該地。（《十六・七世紀イエズス会に本報告集》第II期第I卷）

淡水與雞籠人與外人交易，也出現在漢籍文獻，《東西洋考》記載：「雞籠人差富而慳，每攜貨易物，次日必來言售價不準，索物補償；後日復至，欲以元物還之，則言物已雜，不肯受也。必疊捐少許，以塞所請；不則，諍譁不肯歸。至商人上山，諸所嘗識面者，輒踴躍延致彼家，以酒食待我。絕島好客，亦自疏莽有韻。」

雞籠成為交易地區的原因，主因尋求第三地交易地的大明國人與日本人，以及雞籠位於「福州—琉球—日本」航線，以及「日本—琉球—馬尼拉—漳州」航線上。

從《熱蘭遮城日誌》記載在雞籠娶金包里婦女的喜左衛門資料來看，16、17世紀之交，已經有日本人在這裡生活。西班牙、荷蘭占領雞籠後，也有駐軍與公司人員在這裡活動。

在西班牙統治時期，「福州—雞籠—馬尼拉」的航線已存在；荷蘭統治之後，剩「福州—雞籠」航線，此航線主要是為硫磺貿易。1646年荷蘭為推展北臺灣貿易，開放淡水、雞籠與中國間可自由航行貿易。然而在荷蘭控制下的貿易並不熱烈，不排除有私下貿易。

雞籠馬賽人與金包里社遷徙

除了來到這裡貿易的外來人群，原本住在這裡的居民，是新石器時代圓山文化、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，在17世紀文獻中自稱是「馬賽人（basayers）」。馬賽人包含整個泛北部地區，包含淡水、雞籠、臺北盆地、北海岸、蘭陽平原。《臺海使槎錄》北路諸羅番大雞籠、山朝與金包里社。

翁佳音認為雞籠地區住民屬於金包里（Kimaury/Quimaury）人（Taparri則是沙巴里人）。金包里社址在現基隆市仁愛區一帶，在西班牙人來之前，金包里社主社是大雞籠社，社址就在和平島。1597年的資料提到水道「東北方的島上」住有300名原住民。1626年西班牙占領雞籠島，發現島上的村社，有1,500間香木築造的房子。因此，翁佳音認為金包里主社原是住在雞籠島（和平島），因西班牙人築城而搬到對岸，荷蘭與西班牙人離開後，又回到和平島。

詹素娟與康培德則認為大雞籠社



◀大約完於1590年代的雞籠人圖像。（資料來源／《馬尼拉手稿》）



▲荷蘭人繪製的「淡水及其附近村落並雞籠嶼圖」雞籠局部。（圖片來源／《大臺北古地圖》第53號、第56號，1654年）

是Quimaurie（=Kimaury），金包里則是Taparri。在荷蘭〈大臺北古地圖〉中，第53號「quimourije」則是在和平島的對岸（今基隆市仁愛區），這個聚落包括金包里社與漢人市區（Sangleyparian）。如同前文所討論，馬賽人向來與外人有接觸，並非是封閉的族群，除了與外人有往來，與北部地區的其他原住民也有密切交往。

1661年，鄭成功的陰影籠罩臺灣全島，5月鄭成功登陸的消息抵達臺灣北部，北部的馬賽人開始反抗荷蘭人。6月時，荷蘭人在雞籠的很多房屋被燒毀，被馬賽人包圍而無法補給物資；同時，荷蘭人觀察到鄭軍船隻在雞籠灣與淡水河進行探查。雞籠評議會認為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保留實力與物資去日本，因此決定棄城，暫時結束臺灣北部統治。

荷蘭時代金包里社（Quimaurie）戶口表

年份	1647	1648	1650	1654	1655
人口與戶數	408人 (117戶)	500人 (120戶)	541人 (130戶)	506人 (134戶)	491人 (130戶)

荷蘭人直到1664年10月再度占雞籠，發現島上有漢人居住，並與原住民交易，鄭氏軍隊似乎主要駐紮在淡水。1667年淡水鄭軍企圖攻打雞籠，但未執行，甚至有淡水鄭氏軍隊試圖向雞籠荷蘭人投誠的紀錄，也顯示東寧國末期的風雨飄搖。

福州人貿易往來與街市留存

清代方志提到：「福州街舊址，偽鄭與日本交易處。」（范咸《重修臺灣府志》、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），實際上所指的就是17世紀初期，雞籠地區漢籍商人與外人交易之處。如前文所述，因為「福州—雞籠—琉球／馬尼拉」航線，往來此處的商人不在少數，福州人到基隆更是占了地利之便，「臺灣……北至雞籠城，與福州對峙……」（《臺海使槎錄》）。

清初也已有記載雞籠港內可停大船，故有「其港三面皆山，獨北面瀚海。然西北有籠頭線，東北有雞籠鼻山，港口又有雞籠嶼、桶盤嶼，週圍甚密，內可泊巨艘。」（蔣毓英《臺灣府志》）實際上，18世紀時雞籠港的對外航線仍是「雞籠港（雞籠與烽火門遙對）。由雞籠西北至福州水程七更……。由雞籠西南至廈門水程一十二更。由雞籠東北至日本水程七十二更……」（《諸羅縣志》）可見雞籠港口仍存在其地利之便。

雞籠的福州街地名留存，除了展現17世紀以前本地的交易情況，也是漢人入住的痕跡。翁佳音認為應該是在〈大

臺北古地圖〉的第56號「聖薩爾瓦多（救主）街」，根據比對應該就是「福州街」，有「各式各樣商店、商人」的市街。

基隆港發展與「新住民」移入

基隆是臺灣重要港口城市。1875年，雞籠改名「基隆」，為基隆廳，設臺北府分府通判。到了19世紀後期、20世紀初，港灣建設的發展使得基隆邁向新式港口，從1900到1943年期間，基隆港的建設與擴展，許多相關官員與工作人員於此居住和工作，包含初期的渡臺日人的築港技術官僚，中後期在臺求學的日人技師，以及臺、日工作人員與碼頭工人。因為築港，以仙洞地區為中下展開的築港社區，而有新興產業設團的建立。（見陳凱雯研究）。

原本歷史脈絡豐富的社寮島（和平島），在日治時期以漁業發展、造船業等產業為主，當時日本帝國統治下的琉球人與朝鮮人也移入至基隆地區；到基隆從事漁業、築港工作的琉球人，後來聚集形成聚落，被稱之為「琉球埔」。

戰後，執行遣返琉球人與朝鮮人，仍有部分琉球人與朝鮮人留居基隆，包含在社寮島與基隆市區等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蔓延下，基隆受到波及，留居的琉球人、朝鮮人與臺灣人都有受難者，在社寮島事件中遭難的包含居住當地的琉球人與臺灣人等。

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，不少新住民移入，包中國山東省、大陳義胞等新移民，形成新的社區與文化。☞